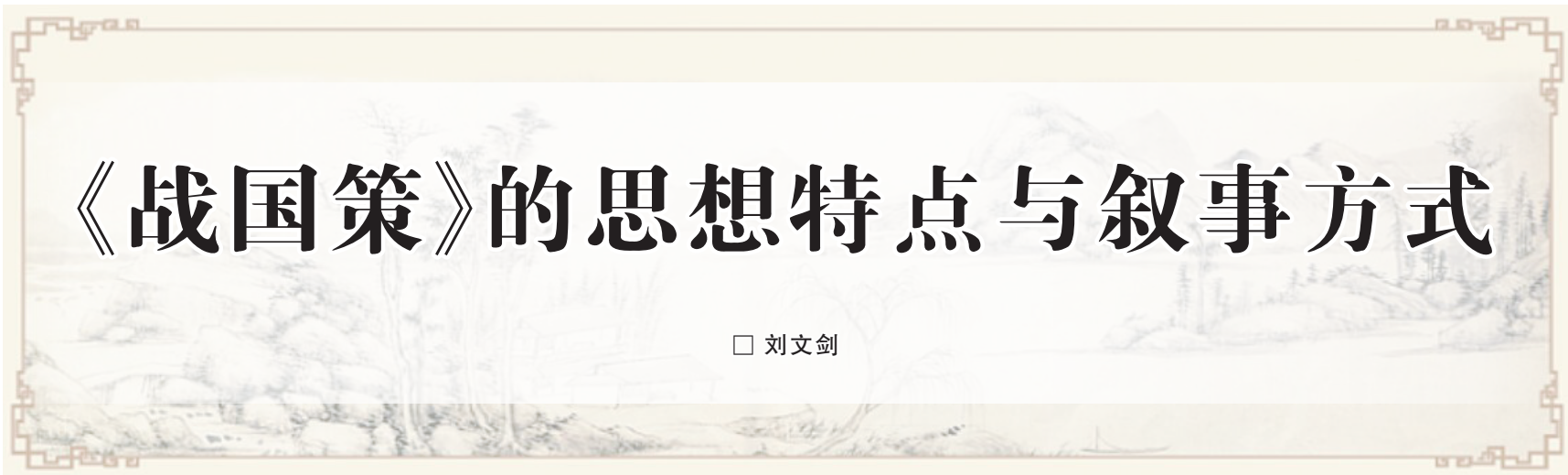




《战国策》的思想特点与叙事方式

□ 刘文剑

在记录先秦历史的典籍中,《战国策》是一部比较特殊的存在。它主要记载了战国后期纵横家、谋臣策士游说诸侯、谋议辩论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可以说是一部“说辞”的合集。

“纵横家”的人生:战国社会风貌

《战国策》成书于西汉,记录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200多年的历史。全书共33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论”,杂记了12个国家的军政大事和人物,是一部国别体史书,约12万字。作者并非一人,大都是战国后期的纵横家,部分篇章出自秦汉时期,最后由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刘向称:这本书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之作,书名之“策”即“策谋”之意,故而定名为《战国策》。后世学者如近代叶德辉、王国维等也认为“策”是“简策”的意思。

《战国策》记录的是纵横策士的人生观,反映的是纵横家们的思想价值取向。他们在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追求举贤任能;在人生观方面追求功名利禄,扬名后世。《战国策》描写了大量谋臣策士奔走于战国诸侯之间,凭借个人之力纵横捭阖,“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能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实现个人价值,是一部战国时期正在崛起的“士”阶层人生行迹的真实写照,反映了战国时期特殊的社会风貌。《战国策》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塑造,因此其展示的思想内容也十分丰富,涵盖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诸家思想,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纵横家的思想。书中记录了张仪、苏秦、范雎等谋臣策士们运筹帷幄、诡谲纵横的谋略权术,以及他们所奉行的实用主义的人生信条和应事权变的处事谋略。“邹忌讽齐王纳谏”的以小见大、“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夸张渲染、“苏秦始将连横”的从容不迫、

“触龙说赵太后”的侧面迂回等,都成为广泛传诵的名篇。

“贵士重士”:跨越时代的思想倾向

与《左传》《国语》等主要反映儒家思想的作品不同,《战国策》的思想倾向明显表现出对个人功名追求的宣扬。比如在《战国策·燕策一》中,苏代称:“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苏代对燕王说:“作为一个有进取心的人,廉洁不会同自身一道显贵,信义不会同生命一起存在。仁义,不过是自我完善的法则,不是追求进取的手段。”关于义与利的关系,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如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舍生取义”,“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等,因此,在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战国策》所宣扬的这种观点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以至于明代大儒李梦阳在《刻战国策序》中惊呼:《战国策》,离经叛道之书也。就连《战国策》的编者刘向也评价苏秦、张仪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谖”。谋略本身并无善恶,在战国这个乱世中,若事事都遵循礼制,不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应变,未免会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劳而少功”,在当时社会收到的实效会很小。因此,《战国策》一改《左传》《国语》等雍容徐迂的风度,把历史的视野从天子公卿诸侯大夫转向了新兴的知识阶层“士”的身上。这是作者历史视野和思想意识转变的写照,《战国策》反映的思想观念是时代特征的体现,是充满时代气息的思想倾向。在塑造这些个性鲜明的“士”的形象时,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认可和倾慕,采取了虚构和想象的文学性描写,如《战国策·秦策一》写苏秦夜谈,“苏秦喟叹曰:‘妻不以为我夫,嫂不以为我叔,父母不以为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箴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是苏秦落魄归家受到妻嫂讽刺后,夜室独语和心理活动,能有谁知道?显然是作者根据传闻加工虚构而成。然而,这种夸张虚

构的描写方式,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使苏秦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此外,《战国策》还塑造了大量不同的“士”的形象,如“高节之士”鲁仲连、颜闾,“勇毅之士”荆轲、聂政,“纵横之士”张仪、苏秦等,这些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标志着先秦叙事文学达到新的水平。

“文辞之胜”:语言艺术的高峰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胜在语言艺术的空前成功。一是先秦纵横家们游说诸侯之辞、臣谏君主之辞,以及发表不同意见的变难之辞,这些游说之辞“辩丽横肆”,极富铺张扬厉、纵横之势,反映出春秋时期谋臣策士从容不迫的说辞特色。如《战国策·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记载了秦国围赵之都城邯郸,赵国覆国在即。齐国人鲁仲连游历到赵,力排众议、力主抗秦,与“亲秦派”的魏国使臣辛垣衍在赵国公子平原君的殿堂展开激烈论争。他列举了周烈王之斥齐威王,殷紂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齐闵王之欲仆妾邹鲁,引喻设比,层层铺垫,句句深入,直陈坐视“邯郸之围”的要害,就是被秦国各个击破,最终使辛垣衍心服口服,解赵之围。《战国策》记录的这些纵横之文,其铺张恣肆的文风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其铺张华丽、气势纵横的语言手法深刻影响了两汉的骈文创作,最终融合成一种新的文体——汉赋。西汉大赋名家司马相如所作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描绘了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之美和天子游猎的空前盛况与浩大声势,浓墨重彩,极尽铺张扬厉之势,文采之盛,就是对《战国策》主客问答、铺张扬厉风格的明显借鉴。二是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法和寓言故事、逸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战国策·齐策四》写冯谖客孟尝君,冯谖用“狡兔三窟”为喻,为孟尝君营造三个可以立足之处,使孟尝君在齐为相数十年游刃有余,屹立不倒;《战国策·燕策二》苏代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劝说赵惠王不要伐燕,避免秦国坐收其利。其他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狐假虎威”等寓言故事在《战国策》中俯拾皆是,恰如其分、比附现实,将

抽象的道理形象化、现实化,具有极强的艺术价值和力量。

“余韵不竭”:叙事文学的肇始

《战国策》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叙事传统、人物塑造和语言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小说等文体创作的文化滋养尤为明显。一是开创后代史传文学的先河。《战国策》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先例,无论是《史记》《资治通鉴》和后世编撰的各朝正史,都借鉴了这种以人物为中心列传的创作手法,例如司马迁撰写《史记》,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主线,编撰书写了4000多个人物,其中精雕细琢的就有300人,比如屈原、刘邦、廉颇等,这些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塑造了一幅跨越3000年的人物群像。此外,后世史书还继承了《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敢于直接表达史传作者对人物、历史的评价,如《史记》每篇结束的“太史公曰”。二是叙事结构和方式的完整性。《战国策》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述,叙述历史事件时条理井然又富于变化的特点在后代话本、小说等文学创作中皆有所体现,对我国古代小说、戏曲的产生发展及其艺术个性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描写,刻画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并且通过时间顺序串联故事情节,重视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全过程描写,采用倒叙、插叙等方式追述事件的起因,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在后世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明清白话小说中被广泛学习借鉴,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艺术魅力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上接1版二条)不应忽视的是,“枫桥经验”在学习推广中也存在模式固化、治理效能不高、智能化程度不足、助力高质量发展效果不彰等问题。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要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实效,实现创新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是历史经验与现实治理的统一、个别治理与普遍规则的统一、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统一,必须坚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学理性的概括提炼,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

从政治与法治交融维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强化党建引领、推动社会善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进行全面部署,强调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人民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探索,已经从社会治安治理领域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新时代“枫桥经验”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要求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枫桥经验”法治化,完善地方立法和乡规民约,实现硬法软法的协同治理。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既要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下推动实现良法善治,更要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角度,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一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纵观“枫桥经验”60年发展历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内核和精髓。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群众“关键小事”,既要敢于“面对面”,也要善于“键对键”,用脚板丈量民意,用键盘了解民意,通过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用工作实绩实效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满意。二是共建共治共享提升治理效能。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充分发挥治理各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推动党委、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协力共建、多元共治,健全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协同性、整体性、实效性,做到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治理成效让群众评判、治理成果让群众共享,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三是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各领域全过程,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必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把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引领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提升基层治理,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

从国内与国际相关维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注重实践创新、分享治理智慧

一个国家或地区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必须基于历史传统、制度背景和文化土壤。衡量治理的好与坏要看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安定和人权保障,要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有效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自身现代化的道路上,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引、没有找到适合的道路,容易陷入经济发展缓慢与社会持续动荡的恶性循环。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亨廷顿悖论”,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廓清了理论迷雾、提供了实践镜鉴。

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预防为基点构建风险防控新体系、以党建为引领筑牢和谐稳定新防线、以人民为中心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以善治为目标创新基层治理新模式,把活力与秩序、维稳与维权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基层治理新模式,为新形势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扎根中国大地、融通中外文化,讲好“枫桥经验”背后的枫桥故事、讲清其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基层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作者系人民警察报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

(上接1版头条)

着力建设人才强省。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江西人力资源相对充裕,但高层次人才较为缺乏。我们坚定不移抓好招才引智工作,组建省人才发展集团,出台具有竞争力、针对性的人才政策,积极探索符合实际、更加有效的高端人才引进方式,持续做大大才增量、提升质量。优化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充分调动用人主体积极性,形成“以产聚才、以才兴产、产才互融”的良好局面,真正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集聚效应。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擦亮现代化建设的生态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江西生态基础好,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1%,空气、水生态质量位居全国前列,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我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加快推动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让美丽生态始终成为现代化江西的鲜明标识和靓丽底色。

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江西生态质量指数全国领先,生物物种资源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珍禽王国”和“候鸟天堂”。我们以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全要素、一体化保护修复,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集中力量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深入开展国土绿化、森林质量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行动,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切实保护好山脉、山体、森林、水系、湿地等生态资源,牢牢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以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发展潮流。对江西来说,这也是实现后发优势的重大机遇。我们扎实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全面落实能耗“双控”约束目标,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等“十大行动”,加快建设林业碳汇、碳排放权等交易市场,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坚持在集约利用资源中谋发展,深入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

结构等绿色转型,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

扎实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江西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省份,肩负着为全国探索经验的重任,东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列入国家推广清单。我们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化路径,全面构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体系,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化,完善市场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全省生态产品信息共享平台,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等环境权益交易,着力拓宽“两山”转化通道,推动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彰显现代化建设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的使命。江西是革命老区,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更为迫切。我们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

建设成果。

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坚持把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民生类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在80%左右,围绕就业、增收、教育、社会保障、“一老一幼”、困难群体等方面,每年谋划办好一批民生实事,有效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努力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江西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连续16年获评全国综治考评优秀省。我们切实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及时妥善处理群众合理诉求,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加快构建精准高效的现代化治理格局。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稳定是发展的基本前提。面对国内国际的复杂环境和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安全之弦须臾不可放松。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牢风险防控各项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更好推进发展。加强经济金融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坚决防范和处置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债务等各类风险,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提高安全水平,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深厚的红色基因,我们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升新时代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我们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注重从政治高度谋划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健全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坚决扛起领导经济发展的政治责任,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当前,江西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对干部队伍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坚持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完善干部选育管用机制,鼓励干部勇于探索、开拓创新、担当作为,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聚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着力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始终秉持赶考的清醒,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推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大力整治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腐败突出问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建设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江西篇章营造良好环境。